

支離破碎的勞工團結

著：何明修（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譯：陳宗延（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五年級）

[按：拙作*Working Class Formation in Taiwan: Fractured Solidarity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1945-2012*，即將於2014年6月由Palgrave Macmillan刊行。本文譯自該書之前言]

台灣的勞工用的雙手製造出經濟「奇蹟」，並且藉由他們的社會抗議和對反對黨的選票支持，帶來了政治民主；然而，在這兩大現代性的成就中，勞工仍然是未被頌揚的英雄。學術研究者在解釋台灣的經濟與政治成就時，多半聚焦在技術官僚和中產階級專業者，而沒有評估勞工階級的貢獻。普遍存在的刻板形象，即是勤奮的、溫順的、去政治化的勞工。保守派讚揚這些特徵是某種儒家或亞洲美德的表現，基進派卻將之貶斥為政治鎮壓的不幸結果。前者主張勞工不需要「階級意識」，而後者則斷言，勞工若有選擇機會便會自發地擁抱「階級意識」。兩個陣營都使用一種高度理想化的「階級」概念；它們都沒有試圖研究勞工實際的意識與實作。儘管他們在意識型態上南轅北轍，卻有一個共識：台灣勞工並未創造歷史；相反地，他們的歷史大體上是由別人創造的。

本書分析在1945-2012年期間的台灣國營企業勞工，考察他們如何設法改變其從屬與依賴狀態，目的在於反駁上述消極觀點。我將突顯，勞工在漫長的二十世紀中被掩飾、隱藏以及遺忘的回應策略，將勞工自身的能動性帶回視野中。其次，我企圖運用台灣經驗來修改勞工階級形構（working class formation）之既有的理論。大部分著作都研究西方國家相對短暫的勞工戰鬥性（labor militancy）升高的時期，卻忽略非對抗性的勞工沉寂（labor quietude）時期。社會主義論述、工會運動、勞資衝突及左翼政黨，經常被用作是衡量「無產者形構成為一個階級」（formation of proletariat into a class）的判準。如此的偏誤根源於一個可疑的假設，即勞工的抗爭是其團結的必然結果，且致使人們不幸地忽視了勞工以較世俗且平庸的方式處理其從屬狀態，以及勞工其對非階級利益的追求。

基本上，這本書的目標是將理論脈絡化(contextualizing the theory)（亦即是理解台灣勞工如何創造自身的歷史與階級）以及將脈絡理論化(theorizing the context)（亦即是形塑一種更具包容性的勞工階級形構模型）。我將在導論章節討論理論性的問題。在呈現台灣勞工階級形構的故事之前，讓我提醒台灣戰後政治經濟的一些特殊性。

國民黨統治的威權政體是異常地漫長、穩定且反勞工的。台灣在1949至1987年間受到戒嚴法的統治，反對黨和罷工是非法的。技術上說，台灣直到1991年修憲為止，都仍舊是一個「動員戡

亂」的戰爭區。在政體更迭的歷史時刻1945年，日本殖民政府已經成功粉碎1930年代的本土自治運動和勞工騷亂，這使得台灣人過於虛弱和無力於挑戰國民黨的新殖民接收。1947年的228事件後對本土菁英與領袖的大屠殺和囚禁，及其後1950年代白色恐怖期間的獵巫，都有助於鞏固外來政權的統治。在與共產黨在大陸對抗的年代，國民黨已發展出一套具有連貫性的意識型態與實作，用來框限勞工，這對台灣留下深遠的影響。國民黨不僅非比尋常地對勞工騷亂敏感，也能夠在1960年代大規模無產化以前，預先形塑有效的勞工控制策略。

國民黨在1945年將日本人經濟資產國有化的決定，在一夜之間創造了一個龐大的國家部門。殖民時期的財閥產業勞工，在沒有社會主義革命的情況下，非自願地成為國企勞工。為鞏固其統治，國民黨在1950年藉由將黨國體制置入台灣社會的每一領域，啟動了一種列寧主義轉型。因此，在戰後初期，一個典型的台灣產業勞工很可能在一間政府經營的企業工作，並且受到黨工的嚴密監督。諷刺地，國民黨的反共聖戰將勞工置於黨國體制監督的國家社會主義之下，這與其主要敵人的共產黨是不可思議地相似的。

漫長的威權主義、黨國與國家控制經濟的特殊組合，可能是戰後台灣獨有的；然而，這獨特性並不帶來一種例外主義(exceptionalism)主張，這種主張認為存在某些異例(anomaly)，無法適用於理論論述的脈絡化。同樣地，充滿敵意的環境並不必然會像傳統常識說的那樣，剝奪勞工不可剝奪的人類能動性(human agency)，他們總是可以採取與結構要求不同的方式來行動，也不見得必然認分接受被支配者的角色。

本書發掘了被普遍遺忘的1947年起義中及之後地下共產黨運動中的勞工武裝鬥爭。台灣勞工並不是被革命性的階級意識激發，而企圖挑戰外來政權加諸的族群支配。直到1950年代中期，國民黨差不多消滅了地下黨叛亂，勞工才被迫順從其劣勢地位。

1950年代中期和1980年代中期間的三十年，在表面上的勞工沉寂中，見證了快速的工業化。國民黨能夠單方面地對勞工加諸黨國控制、內部勞動市場，而不用考慮他們的意願，但這並不意味著，勞工乖乖順從來自上面的要求。因為不存在起作用的公共領域，他們必須用一種掩飾且幽微的方式繼續他們的反對。面對竭力獲取其忠誠的黨國體制，他們採納一種儀式性(ritualistic)的策略以避免政治牽連。他們不會用努力工作以獲得工作升遷，反倒運用他們的社會連結(guanxi)、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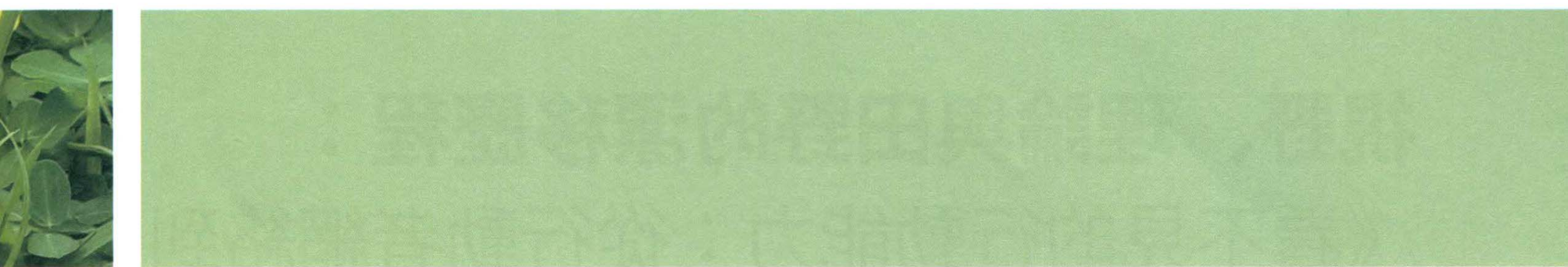
賂和奉承來取悅其上司。在充滿做生意賺錢的機會中，國企勞工兼差打工，賺取額外的經濟資源。儀式主義、拉關係和兼職是台灣國企勞工對其無能為力的相繼回應。勞工在艱苦時期用這些不順從的小動作，設法維持他們最低限度的自主性。然而，這並不是「階級抵抗」(class resistance)，因為這個詞彙應該更嚴格地定義為那些以階級團結(class-wide solidarity)為基礎，且促進階級利益的集體行動。所有這些行動都在個體基礎上被實踐，且符合James C. Scott所謂「日常抵抗」(everyday resistance)的範疇。為了不要美化這些細微且匿名的抵抗行動，有必要強調：關係的廣泛使用造成勞工之間的互相不信任，且恆久了他們面對其上級主管的劣勢。

台灣國企勞工的抵抗在1970年代延伸為更主動的抗爭形式。當國民黨政權開始面對外部的外交危機和內部的政治反對派，它對工會的掌握開始鬆拖。不滿的勞工運用工會管道，提出一系列利益訴求與不平的要求。我將這種實踐稱為瑣碎的討價還價(petty bargaining)，因為工會仍然處於黨國的主導之下，而且這些訴求集中於相對細瑣的薪資和福利問題上。儘管瑣碎的討價還價大體上是無效、偏誤甚至輕佻的，它最終卻為1980年代末期自主工會運動的興起鋪了路。

儘管被南韓、巴西和南非更廣為人知的案例奪去光彩，台灣的國企勞工在國民黨威權政體開始崩壞時，便開啟了他們的社會運動工會主義(social-movement unionism)。具戰鬥性的勞工藉由與反對黨和其他社會運動結盟，以擊敗國民黨幹部，奪取了他們工會的控制權。在1987年解嚴後的十年，自主工會成為訴求勞工改革的主要力量。並且因此創造出一個堅實地以階級團結為基礎的運動。

在台灣，就像在其他國家一樣，社會運動工會主義逐漸淡出，並被一種行事上較保守的勞工抗爭取代。民營化的威脅以及反對黨的掌權，推促國企勞工變得較為內向與封閉，更重視國營企業員工的特殊利益，而不是普泛的階級利益。台灣國企勞工今日所實踐的，是一種經濟工會主義(economic unionism)，在本質上背棄了往昔宣稱的「工運社會化」目標。

在重估台灣勞工鬥爭史時，我挑戰了階級形構的目的論式(teological)概念。階級並未由客觀自在(objective in-itself)進步為主觀自為(subjective for-itself)；也並不存在階級意識從溫和改革主義(moderate reformism)到革命基進主義(revolutionary radicalism)的線性軌跡。不管是在日常或公共的抵抗形式中，勞工所要回應的壓迫情境，並不能被統攝在階級剝削概念之下。也沒



有任何先驗理由，可以斷然主張，勞工終將擁抱其階級認同，而抱棄其他的認同。確實，勞工可能從事武裝革命起義或者扮演改革倡議等活動，扮演具有企圖心的角色；但他們的積極活動往往是間歇斷續，且當境況變得較不利時，便很可能會撤退。

大部分關於勞工階級形構的經典著作都聚焦在一個特定群體的工人（例如舊金山碼頭工人、里昂絲織工人、或曼徹斯特棉紡工人），並從詳盡的案例分析中汲取理論意涵。我的書遵循這項研究傳統，研究兩群台灣國營企業工人，糖廠勞工和石油勞工。他們都能追溯至殖民主業化時期，並都在戰後時代經歷了族群支配、黨國滲透和內部勞動市場改革。勞工們對他們從屬狀態的反應，遵循了上述的歷史軌跡，只是糖廠勞工在威權控制被移除時無法維持持續的集體挑戰，而石油勞工卻開啟了台灣社會運動工會主義的典範性案例。

我理解一個以台灣國企勞工主題的學術專書，對勞工研究者和區域研究專家而言可能吸引力有限。為了延伸我的專論的關連性，我試圖用較廣泛和比較性的方式書寫。我將勞工的敘事放在置於台灣由農業威權主義蛻變為後工業民主的歷史背景中。冷戰反共、對美國的國際依賴、經濟結構的變革與政治轉型在勞工的日常生活中施加了巨大的影響。更有甚者，儘管在意識型態上敵對，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統治導致了國有化工廠之相似特徵，例如黨國監視、關係文化和兼差。在任何可能的情況下，我將分析這些看起來相似的現象背後歧異的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 settings）。

公部門工會並非一個討喜的主題，在美國特別如此，在台灣也僅僅稍好。國企員工太常不被視作真正的勞工階級，而是運用他們的政治影響力以靠稅金維生的、享有特權的公僕。在右翼反工會論述中，他們是脆弱且容易利用的目標。為了避免誤解，必須敘明：台灣的國企勞工不只是垃圾工、公車司機和學校教師，還包括相當大一群在運輸、鋼鐵、造船、電信、電力、機械等等的產業工人（至少在1980年代末民營化之前）。如前所述，去殖民化的歷史偶然在戰後台灣遺留下一個龐大的國家部門，而國企勞工與國民黨政權的相近性（proximity）使他們幾乎無以逃脫族群支配和黨國動員。國企勞工絕非台灣勞工階級整體的代表或典範；就就業安定和薪酬而言，他們足可被稱為「勞工貴族」（labor aristocrats），但他們的經濟特權是以政治自由為代價取得的。如果我們可以考量到其的獨特性，一個台灣國企勞工的故事仍闡明：階級團結是如何沿著不同的制度分歧（institutional cleavages）而崩裂的，以及為何真正階級抵抗的行動總是如此稀少而曇花一現——簡言之，勞工階級形構的學者尋求回答的種種問題。◆